書　評

評介Judy Yung: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王秀惠*

書　　名：*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作　　者：Judy Yung
出版時地：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頁　　次：395 頁

本書是延續近 20 餘年來社會史研究的脈絡，以重視傳統社會上非主流的其他族裔或女性群體，並且注重他（她）們的日常作息、行為模式、及價值觀等，所作的一項重要著作。本書的重要性，尤其凸顯在歷來有關華裔女性的歷史研究專書，幾乎是付之闕如。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華裔婦女的人數稀少，資料零散，不易收集等等因素；因而楊女士的這本專著，更顯示其對少數族裔和婦女研究的貢獻。

本書從作者的博士論文發展而來，以大量的口述歷史為素材，輔以

* 美國卡內基美侖大學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歷史系博士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其他的資料，如人口普查報告、中英文報紙、教會及婦女團體的出版品和各種紀錄等等，採取由下往上的觀點，而非由在上位者來看一般民眾的方式。在本書的研究中，作者重建 20 世紀初期以來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1902–1945)（頁 9），舊金山地區華裔婦女的生活概況，並且檢視她們與身所相處的華人家庭、社區和美國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書名為*Unbound Feet*，乃是借用南宋以來，婦女自幼裹綁小腳的纏足習俗為一種象徵意義，衍伸其對婦女行動力的限制；並強調兩性關係中，女性從屬的地位。但是這個在傳統中國社會延續已久的兩性關係，在移民的過程中，婦女得以利用身處異國時，不同的歷史時段裡特有的時空情境，走出不一樣的路來。

從作者提出的問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掌握本書預欲涵蓋的層面。首先，作者針對移民過程對婦女地位的影響，提出質疑。移民，以及隨後在美國的生活與工作，對婦女的地位而言，到底是具有解放的作用力還是女性持續受到壓抑？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下，華裔婦女如何在種族歧視和性別分工的機制運作中生存？是否華裔婦女侷限於私人（尤指家庭勞務）的範疇 (private sphere)，反而加深她們在經濟上依賴男性並從屬於男性的特質？最後，在華裔社區裡的性別衝突到底有多深？婦女之間的階級和世代的差距，如何造成她們彼此之間經驗上的不同？

楊女士分別由種族、階層和性別的角度切入以上這些問題，探討在美國的華裔婦女之生活，並歸結三項重點：中國的民族主義、基督教義和融合接受美國生活文化，為影響其中發展的因素。以下我將由家庭生活和工作經驗兩方面來對楊女士的論著略加評述。

家庭生活

婦女由中國（其中大部分是由珠江三角洲）移居到美國，不論在婚姻、家庭結構、兩性關係或是下一代的養育，都是一項很大的衝擊。就婚姻方式與家庭結構而言，在美的華僑多數為男性。他們不是未婚，就是將妻兒留在故鄉老家中，服侍父母。為數不多的華裔家庭，大半是沒有父母長輩

同住的小家庭制，因而沒有婆媳、妯娌或是家族親戚等的人際負擔。這樣的家庭結構緊密地維繫夫妻之間互相倚賴的良性互動。此外，華裔婦女的低離婚率，高生育率，使得她們肩負家務和照顧 7、8 個，甚至更多孩童的重擔，以及在兒童成長的社會化 (socialization) 和文化傳承上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婦女身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因此成為華裔家庭裡重要的支撐力量，而這也正是她們在家庭中兩性權力架構裡擁有一席地位的來源（頁 46）。

但是作者忽略了一點。這一發展，固然是有別於當時的中國農村社會（以移民所來自的珠江三角洲而言）；然而相較於其他移民至美國的族群，如波蘭、義大利等移民，卻是類似的，只是後者藉由親屬朋友移民，環環相扣，形成人數龐大的移民族群。但是婦女在移民家庭中的責任地位之重是毋庸置疑。工業化的過程造成一波波的人群離鄉背井，移往大城市，甚至國外。在異地打拼，節衣縮食，建立新的基礎，還要存錢寄回鄉里，移民婦女是家計上重要的管理人。此外，離開家鄉，意味著許多親族舊友關係的斷裂及相關倫常規範的鬆弛。維繫家人的情感，尤其是面對下一代的「美國化」所無法避免的文化衝突，在在都是移民婦女所無法規避的問題。

因此我們若是以人口流動的角度（不論是國際間的移民或是美國境內的城鄉遷移）來看，華裔婦女與其他移民族群的女性，其相似性是很大的。① 作者在書中固然引用一些有關白種或是西班牙裔族群的婦女研究作為比較，卻仍是選擇使用種族 (race) 為切入點來看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而不用族群 (ethnicity)，似乎侷限了她的涵蓋面。②

誠然作者可能是因華裔在此一歷史期間，受到社經和政治上的各種的不公平待遇，因而強調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 (racism) 帶給華人婦女負面的影響。對於早期，尤其是 19 世紀末的華裔婦女來說，移民到舊金山，囿居在以男性為絕大多數的華埠區裡，既不敢出外，更遑論涉足社區之外對華

---

① 各個族群因其文化背景，自然仍有些差異。如愛爾蘭移民女性的經濟獨立特性，猶太家庭鼓勵婦女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義大利家庭則因男性強烈的父權思想，使婦女不但早婚而且是全職的主婦。

② 種族 (race) 的字義較偏重生物上所造成的差異。族群 (ethnicity) 則較注重由文化傳承或歷史經驗而造成的不同。

人懷有敵意的白人社會。其所受的行動限制，比之於纏小腳，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較之於同一時期其他族裔的婦女，移民到美國所造成生活上的變化，對於華裔婦女而言，並非就是由中國社會價值觀裡男尊女卑的箝制裡解放出來，反而加上種族歧視的因素，踏入了一個枷鎖更多，捆綁更深的窘迫困境（頁 16）。

但是既然引用種族為切入面，黑人婦女的歷史經驗較之於華裔婦女卻又不盡然相同。在奴隸制度時，黑人即因奴隸的買賣，以及男女奴隸的分工差別，男性奴隸的勞力是農場工作所需，女性奴隸則是集中於家務性的工作而服務於城市裡，因此黑奴的家庭制度破碎。有許多的黑人家庭是以女性為其戶長。當黑奴解放之後，一些黑人家庭由農莊移到都市裡，或是一次大戰前後，無數的黑人家庭由南方北移至一些北方的大都會區。城鄉遷移的變化，更是逐漸地加重黑人婦女在家庭生活與家計收入的地位，造成更高比例的黑人家庭是以女性為其戶長。③ 這種現象在華裔或是其他族裔的移民家庭裡是非常稀有的。

在這一時期，教會對華裔家庭的介入及對婦女解放的啟示，書中有詳盡的分析。作者明言，教會對華人婦女的生活改善，有利有弊。一方面，教會提供婦女許多不同形式的幫助。如營救受到迫害的華裔妓女或是身受欺凌的女佣（書中稱之為妹仔），提供了暫時的收容和法律的保障，使這些弱勢婦女了解她們在法律上的權利；宣傳纏足的惡習，推動解放纏足運動；協調家庭糾紛；提供不同的活動，使婦女有接觸外界的機會，開闊她們的視野。但是另一方面，教會仍以維多利亞時期的教條，教育華人婦女。強調傳統女性的角色，尤其是著重在家庭裡，操持家務，照顧家人、幼童等，謹守女性的份內工作，並順從男性的權威。這些教義規範女性的行徑，卻也侷限女性發展的空間（頁 36, 136）。

作者的一個重要貢獻即在分析闡述美國教會改革者的一些策略與民初國內的有關婦女運動的思潮彼此之間的互動，及它對華裔婦女的影響。在 20 世紀初期 (1902–1929)，教會功能對華裔婦女生活的影響較為重大，

---

③ 參見 Herbert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 (New York, 1976), pp. 443–4, 452, 454–5, 525–6.

還有教會推動的一些社會改革中，有關婦女解放的訴求，如鼓勵女性受教育，婚姻自主，參與或主辦華人社區的公共活動。教會工作者希冀經由重塑華裔婦女柔弱無知的形象（尤其許多委身為妓女），改善女性的地位，贏得她們皈依基督，以為他日傳揚基督信仰，甚而教育中國能如西方一樣成為文明國度的目的。有趣的是，這項訴求與民國初年以來，中國社會反封建和帝國主義的潮流結合，使華裔女性將其在美國社會所受到的歧視和羞辱與中國國力的積弱不振和一些社會制度的不合時宜相連。因應這股潮流的激勵，華裔婦女逐漸接受「新女性」思潮的薰陶和影響，並反應在她們開始力求改善所處的特殊異國環境（頁 53，108）。借助於教會組織如 YWCA 等，華裔婦女開始有自己的婦女組織，強調女性自我成長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reliance)。作者強調這項發展對新一代在美國出生成長的華裔女性，意義尤其重要。婦女解放的訴求讓她們得到啟示，有勇氣去挑戰親身經歷的雙重箝制：一方面是自幼所受傳統中國文化的家教限制；另一方面是美國社會的種族和性別歧視。

工作經驗

華裔婦女出外工作，種因於種族歧視造成華裔男性就業機會有限，因而需要女性的就業，支援家庭經濟（頁 83）。但是種族歧視與出外工作其間的因果關係如何，作者的解釋與立場似乎有些模糊。在書中前半部，作者強調婦女生活（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婦女）在種族歧視的陰影下，既無法出外就業，甚至踏不出華人社區之外，遠不如其他族裔，如愛爾蘭或是猶太裔的女性。後者藉由出外就業，逐漸建立獨立自主的特質（頁 25）。但是有趣的是，愛爾蘭的女性移民，大多數進入女傭的行列。④ 當華人婦女有機會或有需要出外就業時，她們從事此一工作的人數卻不多。相較於日裔婦女從事女傭的人數而言，第二代的華裔婦女，因其薪資低，工作繁重，

④ 參見 Hasia Diner, *Erin's Daughters in America: Irish Immigrant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及雇主的嚴苛監督，不願進入這一行業（頁 136）。在三零年代，女傭這一項行業不受 NRA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的規章保障最低薪資和最高工時，土生土長的華裔婦女，更不願從事這一行業（頁 200）。因此，以女傭為例，華裔婦女的就業模式，與種族歧視的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似乎不如作者所強調的如此緊密。

在美國的資本主義下，婦女從事的工作形式，大半是上班時間彈性，不要求特殊技術，或是按件計酬的勞工。其中又有許多是在家就業，如作為寄宿家庭或是家庭手工。對於仍然身兼母親和妻子的許多婦女，形成既有工作又有家庭的雙重重擔。我們可以由華裔婦女的就業模式，檢視一個重要的議題，亦即資本主義對性別分工的意義。以華裔婦女的就業經驗來看，再次證明女性就業並不必然拉近兩性之間的差異。多數工作的婦女，仍然無法卸下洗衣燒飯，照顧家庭的擔子。此點使華裔婦女的歷史經驗，相近於白人和黑人婦女的經驗。但是黑人女性，其就業的模式，與白人或是其他族裔（包括華裔），仍有許多的不同。黑人女性不但是出外就業，即使婚後仍然持續在就業市場裡。再次顯示作者單純地以種族的觀點來剖析華裔女性的歷史經驗值得商榷。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業所帶來的收入報酬，給予華裔女性的意義，除了經濟上的實質含意之外，還使得女性得以建立個人的獨立自主，以及在夫妻關係上得到男性的尊重（頁 91）。更何況如果女性是出外就業，還有踏出家庭或社區之外接觸外界的經驗，如進入車衣廠的工作。這層意義，在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華裔車衣女工抗爭雇主不平待遇，與白人車衣工人合作的事件上，尤其鮮明（頁 193–195）。

隨後二次大戰時期的歷史發展，凸顯了美國的華裔婦女在愛國氛圍和對祖國的情感交揉之下，所產生諷刺而又受命運捉弄的景象。因為男性上戰場，勞工市場因而大量引用女性。如同美國當時的其他女性一樣，華裔婦女把握這一特殊的歷史情境，進入各行業，成為護士或到船廠去做工等。此一發展，證明在此之前美國社會裡性別歧視對一般女性就業的影響力。可悲的是，許多的華裔婦女並不認為受到種族或是性別的歧視；反而認為船廠的工作，既有高薪，又有接觸外界的機會，更何況還是報效身所

居住的國家與祖國。出外就業，關懷國事，以及投入義賣籌款，或是參與紅十字會的救國活動之中，本是華裔婦女獲得自信，追尋兩性平權等女性主義實現的大好時機；但是她們放棄了這些訴求，反而將愛國的情操表現放在優先。

綜合言之，楊女士著墨於種族與性別對華裔女性的壓迫，強調她們努力地開闢一片天地時，所須付出的重大代價，確是本書的一大貢獻。這一題材對於少數民族又是女性的婦女研究，具有深遠的啟示。